

唯能解答人们的现实困惑，
才见学问之真实不虚。

人間隨喜

別冊

对话与问答



【编者按】

《人间随喜》辑入文章最初见于两岸各大报刊，这些文章逐渐引动起一股兴扬之气，不少读者心有所触，纷纷与作者进行交流，无论对话，还是提问，颇能对应时代人心。

本别册将围绕《人间随喜》某一篇文章的对谈汇编到一起，并从文章中抽取一段相应内容置于对谈之前，以供参照。希望这些对谈能带给读者更为直接的启示。

对话者简介

[怀仁] 现居德国，古典印度学学者，清华本科，北大硕士，留学德、英。

[彭璐璐] 现居北京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生，曾任北大国学社社长，著有《掬水月在手》。

[谢翔] 现居上海，2011年于西南民族大学毕业，插画家，绘本作家。

[区桂芝] 现居台北，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国文教师。

[杨宴来] 现居北京，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。

[李志鹏] 现居北京，中国社科院博士，任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。

[畸笔叟] 现居上海，东方卫视首席策划。

[黄彦儒] 现居台北，台大历史研究所研究生。

[浅酌] 现居上海，任教于小学。

[蔡奇璋] 现居台中，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（Goldsmiths College, University of London）戏剧博士，任教于东海大学外文系。

索引

谈《楔子：〈人间随喜〉缘起》.....	1
谈《躁郁时代》.....	6
谈《请慎言“启蒙”二字》.....	9
谈《一以贯之——忠厚者与聪明人之过》.....	10
谈《才情之外，才情之上》.....	13
谈《黄仁宇与宅男》.....	18
谈《万象历然——关于文艺》.....	22
谈《只因那光明喜气——我与京剧的初识之缘》.....	27
谈《晚九朝五》.....	29
谈《“乐”》.....	32
谈《祖父祖母，皇天后土》.....	35
谈《法隆寺的黄土墙》.....	37
谈《无心，以成其大——关于书法》.....	39
谈《重建师生关系》.....	40
谈《食养山房，唱京剧》.....	48

谈《楔子：〈人间随喜〉缘起》



二十几年前，我怀着对中国文明的孺慕之情，进了台大历史系；四年后，塞了满脑袋专有名词，我却一身狼藉，对真正的中国文化，也完全迷茫。前年去世的台湾文化界名人孟东篱，五十年前，也同样怀着满身困惑，进了台大哲学系。他一心要解决人生之大惑，但是，他听了课，读了书，却依然完全无解。

怀仁：读到您和孟东篱先生在台大的经历，欷歔不已。我的大学本科经历，和两位先生截然不同，当时在清华学习理工——高考前自己也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，当工程师的父母希望我也走这条路，而我理科还不错，就学吧。脱离高考的压力，年纪也增长些，在偌大的校园里才开始体会生命中的徘徊与无可安顿。

那时，各种各样的工程理论、实验课程、机械绘图、工厂实习，都让我感到极度的疏离和痛苦，因为所有的学习都和生命无关——这是我当时常说的一句话。但是，这句话在同学里完全没有共鸣，不仅没有共鸣，简直被视为奇谈怪论。和两位先生彼时的困惑相比，我的困惑微不足道，却也既具体又模糊：具体在，我始终在想如何能跳脱这种被冷冰冰的机械、仪器所充斥的生活，甚至闪念过退学（可是没有方向，退学何用？终是未果）；模糊在，不明白生命里怎么会忽然如此困惑——特别是在那样一个众人都目标明确地奔向锦绣前程的环境里，实在太格格不入——甚至往哪个方向去解惑都不清楚。

大学五年（清华那时本科学制五年）下来，究竟想做什么懵然无知；可是不想做什么，终于是清清楚楚了——绝对不会去做一个工程师了。有次和一位文学社的朋友聊天，他笑称我们这种人，都是清华败类。应该说，是那个“理工帝国”的败类。

发现我偏题太多了。抱歉。

薛：凭良心讲，我喜欢这样子的偏离主题。因为你的“偏离主题”，反而有助于让我们一下子就进入了“正题”。

首先，我这本书本身好像也不太有明确的主题；其实，所有的生命之书，都很难说有什么明确的主题。这就好比说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，主题又是什么呢？若认真要问这问题，显然，是有些好笑的。既然我没什么明确主题，和你如此偏离主题，反而是某种程度的相应。话说回来，如果真要说出一个我这篇文章甚至是这整本书的主题，恐怕最合适的还是——“生命的实感”吧！你这两段，不也正是你最真切的“生命实感”吗？

其次，中国学问的根本体质，是《大学》里头说的“格物致知”；学问是先格物，再致知；格物是感，所以，中国学问是先“感”而后“知”，“感”必须在“知”之前。时下的主流学问，之所以与生命有隔，之所以与人不亲，就在他们的“知”之前，没有那个“感”字。我这本书搜罗的文章，认真说来，都可以算是论述文章；但绝大部分，都写得像散文，也多半从我个人的感受体会出发。这看来没系统，也看似不客观，但其实却是依循着中国这先“感”后“知”的老传统。换言之，虽说我写的是论述文章，但我却不是特别想要说服别人；我尤其不喜欢有种盛气凌人、咄咄逼人的姿态。但是，如果有人因为这些篇章而有所触动，我却会觉得很开心。

与其要说服人，我宁可希望文章打动人。



若无喜气，人间何欢？若无喜气，又何须看重此生？中国这个喜气的民族，即使再苦，也多有不苦之处，也想法子要苦中作乐。

怀仁：话说，“随喜”这个说法，还真是从印度来的。巴利文和梵文都是 anumodana。溯其词源，anu 意为“跟着、跟随”，modana 意为“喜悦、高兴”，若直译就是“跟着高兴”——不就是“随喜”吗？一个小词，可见前人翻译之精当。当然，中国人绝不是因为引入了这样一个词，才懂得这种为人处世之道；大抵是此异域之词，让中国人深感贴切了自己生活中随缘欢喜的行为吧。

在我曾经走访过的国家中，若问最喜欢的地方，首推印度和日本。喜欢日本，很大程度上非因其是日本，乃因其像“中国”。倘论起这些国家里人民幸福指数最高的，无疑是印度，没有之一。要问起印度人怎么幸福法，只要看着他们的眼睛和微笑，那种似乎与生俱来的乐观与不耽著，是对“随喜”最好的注脚。

薛：我很喜欢你最后说的这一句话。一个民族的性情，完全就写在那一张张脸上，看他们的眼神，看他们的笑容，其实就已说明了一切。

昨天有个学生向我说，最近她大量阅读了印度灵修大师的作品，赫然发现，虽然彼此完全不认识，也完全没来往，但是，他们的作品竟然与胡兰成先生的文明理论极多相通，其中某些演讲甚至可以直接视为胡先生许多只字词组的详细脚注。

我笑着说，这是当然。东方的世界，中国、印度、日本三大文明，若真正进入了自家文明之最根柢处，彼此就多能互通；因为，这三者的文化血缘，本来就颇为相近。只不过，百年来中国离自家根柢离得远了，

以至于读书人看印度、看日本，反而疏隔，反而不容易感觉亲切了。

只要是古文明延续至今的国度，只要是百姓涵泳在自家的文明里，日用而不自知，他们的“幸福指数”多半不低。我看日本的老人、台湾乡下的老人，都有这种感觉；我这本书特别着墨于台湾民间，也是这个原因。我虽然没去过印度，但单单根据你的观察，就让我心向往之；这也和我心中的印度，非常一致。文明文明，文而明之，一个绵亘数千年的文明，自然会有种根柢的强大力量，让人在里头“文而明之”，让生命多有景致且又风光明丽。三大文明相较，现在的印度最依然故我，印度的传统也最没断裂；所谓传统最没断裂，指的是现在印度人的性情与思维，都与过去最无二致。但有趣的是，印度虽说文明主体性最强，特质性也最高，但印度在近代遭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却是最为酷烈。他们被强势的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了那么久，除了因特殊的历史渊源而不得不使用英语之外，好像，西方的统治并没有真正改变他们多少；不管是性情或思维，乃至生活之种种，印度似乎依然是那个极鲜明的印度。至少，直至今今，印度人还是不太把西方人奉为“乐器之王”的钢琴放在眼里；印度大学的音乐系将钢琴列为主修，已经是非常晚以后的事了；在许多印度人的眼里，钢琴这种只有固定音、完全没有弹性音的乐器，真是一种“不良”的乐器。哪像两岸的华人？大家一说起弹琴，反射动作，几乎就是想到弹钢琴。你如果向台湾年轻人说弹古琴，他多半还会问你，什么是古琴？

怀仁：幸福的人们，无论身处何方，有一点是相似的——他们知道如何快乐，而不为外在条件所约束。快乐就是他们的生命状态——大多数现代人对此已经完全陌生，因为我们现在最擅长的，就是知道如何不快乐，无论怎样，都可以不快乐。在下不才，也深谙此道。

而一想起印度人，脑中浮现的景象总是他们一边摇着脑袋表示赞许，

一边眼中漾出微笑。记得我去印度，入乡随俗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和他们一样摇脑袋来表达 yes，于是也很快被这种生命的快乐感染，整个身心都不由得轻松起来。

薛：我觉得印度人的放松，最可以对治现代中国人的过度紧绷；至少，那一定是一个强大又很有意思的参照坐标。印度人的那种放松，是源于生命的某种通透，是因为看清了生命的某些本质，于是，不沾不滞，不让生命紧紧地黏死于一处。这和某些人把放纵说成是放松，和某些人整天吊儿郎当、漫不经心，又和某些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，当然，都完全不是一回事。

我当初写《孔子随喜》，其实就特别标举了孔子“松”的这一面。不过，也因为这个标举，引来了“严肃”的儒者对此书的质疑。事实上，我之所以特别标举，就是想要在自家的根源里，做个回溯，做个澄清：孔子不可能是铁板一块，我们这民族也不是从来就那么紧绷，更非从来就这么不快乐。不管是《论语》，抑或是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，我们都能很清楚地看到孔子“松”的这一面；换言之，我们分明就看得孔子那张很轻松的笑脸。可惜的是，后儒，尤其宋以后的儒者，有意无意都将这一张脸给“屏蔽”了。正因孔子有“松”的一面，所以，他才可以和老庄，和禅宗，乃至和整个中国民间都无有隔阂；用我的话说，这样的孔子，才可能与万民“闻风相悦”；这样的孔子，也才有办法真正成为“万世师表”。

为人师表，不该让人老紧绷着脸，而是要让人开启智慧，生命通透，进而欢喜自在。《论语》开篇的“不亦悦乎”、“不亦乐乎”，岂是虚言？好的老师，甚至不必多言，也不必针对你说法，但凡看着他生活，看着他与人应对，你就会被他的快乐感染，整个身心都变得轻松。这在老庄，叫做“大化无形”；若在儒家，则称为“身教”；如果是孔子，他就会笑着说道：“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尔。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”

谈《躁郁时代》



我以前念台大，跟着大家一道拥抱自由主义，相信这是台湾的主流，现在如此，未来更当如此；后来，再看了一看，才发现，无论知识界抑或艺文界，虽然大家不愿承认，但真正的主流，其实是虚无主义。虚无的原因，固然林林总总，但最根本处，仍源于这种扞格与冲突；于是，读书人摆荡，读书人彷徨；又于是，读书人比常民更容易烦忧，读书人也比常民更多躁郁。

彭璐珞：禅者的“无立场”，看似有如虚无主义，两者有何本质的区别？

薛：禅者的“无立场”，是不预设立场，是不为任何立场所执；虽说如此，禅者又必须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必须能在每一个当下，如实、准确地对应。“虚无主义”不然，他的后头是啥，别人弄不清楚，自己也说不明白。

彭：为什么这个时代会有一种普遍的虚无心态？禅者又是如何超越这种心态的？我理解之所以虚无，是因为旧的价值体系被打破，而新的又未建立。那禅者似乎也并不试图建立任何价值体系，却为何又不会流于虚无？

薛：禅者不试图建立任何价值体系，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一个价值系统。事实上，没有任何价值系统之人，必定是虚无主义者。禅者，既然活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下，必然也身处于一个具体的文化系统。只不过，

他不为所执，更知其有限、明其不足罢了。

彭：禅者的价值系统，是什么呢？

薛：中国禅者的价值系统，自然有着中国文明儒释道三家之基底。

彭：我的感觉是，中国禅者就其所成长的文化根源来说，普遍应当是有儒释道的基底，但其本身，是否必然以此为背景？既然不预设，为何又有此价值系统？在中国文明之外，是否也存在禅者？禅既然直指人人皆具的如来智慧德相，就应当是超越各种文明系统，而具有普世性价值的。

薛：不同文化区的禅者，有其共相，也会有其殊相。就禅的特点而言，他们当然一致；但印度的禅者、日本的禅者，就一个具体的生命而言，也必然有些价值与中国禅者略有殊异；但是，这不影响他们之相契。禅若有其超越性，或者说有其普世性，正在于“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”的能力。这先入后出，然后再出出入入，才可能成就一个既清楚自己是何人而又明白自己有何局限之人。明白自己的局限，就不执著；清楚自己是何人，便不虚无。

彭：躁郁的众生，在生活中，如何保持那一念明觉，如何实实在在地做功夫？

薛：若真的是“躁郁的众生”，就很难“保持那一念明觉”。除非是躁已歇、郁已缓，然后，自己还得从“众生”的状态抽离得开；若是如此，“一念明觉”方为可能，然后，也才会有如何“保持”的问题。

彭：师兄平日如何修？

薛：说来惭愧，我并不是一个太认真修行之人。如果真要问如何修？我也只能说，有状况就修。至于我状况多不多？老实说，还真不少。大状况不见得挺多，但小状况却是一点儿都不少。我很留心寻常生活这些

大大小小的过失与烦恼，现在通常烦恼一起，我大概就察觉了；对之，倒是不后悔，也不懊恼，但是就不放过。通常我只要人不清爽，就不太会放过自己，就得弄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行；我一定要感觉到、一定要明白到底是哪个关节自己轻慢了或者习气太重了。此外，这几年我看自己，有时会像看别人；常常会像个旁观者在看着自己。这有个好处，就是事情一旦弄明白了，通常就云淡风清，顿时清爽了。事情过了，也差不多就过了，不会耿耿于怀，几乎也不放心上。我不太会跟自己过意不去。

谈《请慎言“启蒙”二字》



从五四运动以来，知识分子如此好言“启蒙”二字，当然是受了西方影响。“启蒙”，本来就是个翻译词儿；其实，那是读书人全盘西化之后，用中文讲着法兰西话罢了！

谢翔：“启蒙”二字，虽说有些矫情夸张，但想来也应该不是完全荒谬的，确实对应了社会愚昧的一面。您这样批评“启蒙”二字，恐怕许多知识分子不能同意，是不是这批评的背后还有一番道理？

薛：中国传统不说“启蒙”，说的是“教化”。百姓当然有愚昧无知之处，那是需要“教化”，而非“启蒙”。以前读书人当地方官，头一件大事，常常就是兴学立教；最重要的政绩，是看移风易俗到了什么程度；其实，这都是“教化”。

“启蒙”与“教化”，看来相似，其实完全不同。最大的差异，是我说的，“启蒙”是读书人全盘西化之后，用中文讲着法兰西话；是用西方的价值观，来“改造”“民族性”，“改造”庶民百姓。而西方那套异质的价值观，若要强加于百姓，读书人与百姓必处于扞格的状态，两者的关系必然是紧张而疏远。“教化”完全不同，读书人的价值是源于民间而比民间清楚自觉。因为根源相同，是同一套价值，所以彼此说得上话，可以相互闻问；又因为清楚自觉，所以能够“教而化之”。

谈《一以贯之——忠厚者与聪明人之过》



未谈“一以贯之”，先来说孔门之对应。……有对应，就有生机，便活泼。真正的教育，从来就该是这样子的鲜亮；真正的教育，本来就该打着生命之痛处。两岸教育之败坏，关键之一，就在于打不着痛处，只在知识与意识形态上纠缠不清；那种最该有的鲜明而深刻的生命对应，已完全付之阙如。

谢翔：谈“一以贯之”，却通篇没谈这个“一”究竟为何？

薛：孔子说了半天，不也从没谈那个“一”究竟为何？

当然，你可以说，孔子说的“一”就是“道”，就是老子说的“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”的那个“一”。但“道”是什么？老子的那个“一”又是什么？类似的问题，你可以一个一个没完没了地追问下去，但问题是，这样的追逐概念，如此的穷究分析，对你自己有何益处？有助于面对你的根柢烦恼吗？

许多读书人受西方影响，凡事总爱将概念定义得清楚明白。若是没有定义，他们要不完全不知如何是好，要不便完全视之如敝屣，就一口咬死，说那没有价值。结果，你看看这些迷信概念分析的人，真正面对生命的困境时，一个个仓皇失措、踉跄不堪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概念分析，根本无法转化成生命之能量。所以我才会说，“概念也好，知识也罢，毕竟是身外之物；凡此，并非不好，只是不相干；凡此，皆无助于面对生命的根柢烦恼。若是听凭概念的无限延伸，放任聪明之不断扩展，

那其实都是逐物，都会是庄子所说的‘往而不返’。”

中国的学问，都是体证之学，重点都是如何转化生命能量。我当初写《孔子随喜》，就特别强调，我不谈一般所谓的哲学思想。全书真正关心的，是如何通过我的体会与实践，与读者有当下之对应；这篇当然也是一样，通篇没谈那个“一”究竟为何，但如果读完之后，有了“一番领悟与憬然”，其实，这时就慢慢可以体会那个没有明说的“一”了。

谢：这样会不会使学问流于个人主观，成了大家各说各话？您看现在市面上那些五花八门的国学书……

薛：那些国学书籍的问题，是在于太浅，太偏，又太不相应，倒不在于是否过于主观。

其实，将主观与客观看成截然对立，本来就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式二元思考；中国人不是这样子看事情的。在中国的传统里，主观与客观，本来就是“亦客亦主、时客时主”；主观与客观，两不妨碍。体证之学看似主观，但其中之高低深浅，却有着极客观的判准；至少，是瞒不过明眼人的。而且，当自己体证得越是明晰，通常便越轻易能“客观”地看人看事。相反地，中国的学问若是抽离了个人体证的基础，而一味地强调所谓“客观”，其实会变成一种什么都不是的伪客观。

* * *

区桂芝：忠厚的人，好心做坏事，其为害之大，往往更甚于存心使坏的奸恶之徒；聪明人急着卖弄聪明，使劲争取舞台，造成看似百家争鸣、实则乱象纵横的社会。我们的教育太缺乏耐心锻炼“智慧”的过程。

薛：确实，我们的教育对于锻炼“智慧”，几乎是无能为力。

无能为力的部分原因，是压根就无心于此。本来，教育对于一个社

会，要不扮演踩刹车的角色，要不就推波助澜；换言之，教育可以指导社会，也可能只是迁就社会。目前看来，两岸的教育对眼前的社会，都进行了过多的“服务”，差不多都是在推波助澜。如果眼前的社会，大家都觉得挺好，多半也能安身立命，那么，继续“推进”，也是应该。但事实上，又不是这回事。

我前几天翻我二女儿小学四年级的课本，感觉是，太贴近现实了；换言之，他们的课本，也可以说他们的教育，都太想发挥实际的效用。但恕我直言，这样的迁就社会现况，其实，不就是所谓的“急功近利”吗？既然急功近利，又如何开启小孩的智慧呢？

智慧是什么？智慧是对生命的观照。要观照，就得暂时从现实抽离，就得拉开一些距离。中国人说“无用之用，大用矣”，那才是智慧。

区：社会上，好人太多，好事却不多；名人、名嘴、名士太多，清明太少。孔老夫子的“一以贯之”，这“一”的确不易掌握，不易参透。它不能精确定义，全面理解需要“大智慧”。孔子以一生锤炼的“道”，平庸如我辈，更需要以一生去琢磨。

薛：我觉得“琢磨”这个字眼用得好。这个“一”，或者说，这个“道”，本来就是琢磨、体会而来的，若真要定义、分析，都只会越离越远。禅宗说，“不说最真切”，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，“道”是体证之事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；语言、文字皆有其假相，如果沾黏其中，整天忙着分析、定义，整天在观念的葛藤里翻搅，那终究都要误人误己的。

谈《才情之外，才情之上》



女子的元气与大气，是因不为才情所执。有才也好，无才也罢，重点是，女子鲜因才情而既骄且吝。

谢翔：最后几段谈女子，句句都是结论，真是让人好一番琢磨！既然“女子鲜因才情而既骄且吝”，为什么还要说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呢？

薛：“无才”当然不是真的毫无才能。若真的笨手笨脚、毫无见识的百无一用之人，不管是男是女，恐怕都没人会将他与“德”字联系在一起吧。

“无才”其实也就是不显才、不逞才罢了！老子说“无为”，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；所有的作为，暖暖内含光，抱朴守拙，不刻意，没造作，一任自然，那就是“无为”。也正因如此，不添乱，不惹事，怎么做，怎么对，所以老子才会接着说，“无为而无不为”。女子因不显才、不逞才，故而再多的才情，都不会是负担，都让人看得舒服、看了清爽，这就是德。

老实说，男子无才更是德。只不过，女子天生有一种柔软，要她们不显才、不逞才，其实容易；但要男人完全做到这点，挺难。

谢：男女之间看到并学习对方身上的优点，是一种内在的扩充。这也使我想到您在《一以贯之》一文中谈聪明与忠厚的问题。但同时我又会觉得，不管是男人与女人，还是聪明与忠厚，任何一端，其优点与缺点似乎都是同时并存的，像一个东西的一体两面，很难说要这个却不要那个。林谷芳老师曾说，“生命的修行往往是在两个矛盾现象上求得统和”。您如何看这矛盾？如何在这矛盾中求得统和？